

社会现代化视角下养老责任观念的代际差异

——基于分位数回归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谢秋杰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的背景下, 探索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是否已经发生转变及其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 本文依托CGSS2023数据, 系统探讨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代际差异不仅显著影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 还呈现出显著的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 且住房面积在这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并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基于此, 本文认为: 要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加大农村地区的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稳步提升城镇地区的养老服务质量, 从而最终实现在顺应居民养老责任观念发生转变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现代养老体系的目标。

关键词

代际差异, 养老责任观念, 分位数回归, 有调节的双中介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A Study Based on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Qiujie Xie

School of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15,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increasingly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of residents have changed and the reasons behind i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relying on the CGSS2023 data,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st differences on residents'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 residents'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but also show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t the level of concept intensity. Moreover, housing area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shows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elderly care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steadi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urban areas, so as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lderly care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Concept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Quantile Regression, Regulated Dual Medi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养老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中国的传统养老责任观念中, 依赖子女养老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国民对养老责任主体的认知[1]。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持续加快, 我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已发生深刻转型, 居民对于养老责任主体和养老责任观念的看法可能也发生了转变。而代际群体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亲身经历者, 由于其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差异, 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逻辑, 进而对养老责任的归属及其养老行为的承担方式产生了显著的代际分化趋势。有学者认为,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 子女也应当承担首要的养老职责, 因为他们是养老资源的主要供给者[2]。但也有学者认为依赖子女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渐弱化[3]。

在社会转型持续加速的背景下, 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是否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国已有较为充足的有关养老责任主体以及养老责任观念的研究, 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经验。但现有研究仍有一定不足, 在数据的选取上多基于较早年份, 或在机制分析中使用的检验方式较为单一, 尤其是缺乏基于社会现代化视角探讨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在社会加速转型的现代社会, 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是否已经发生深刻转型? 不同代际群体内部对其养老责任观念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以及是否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本文系统分析的焦点。基于此, 本文依托 CGSS2023 数据, 以代际差异为视角, 立足于社会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深入探讨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 以期展示我国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现状, 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养老政策提供一定的经验指导。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现代化与代际差异

从理论基础上看,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等多维度全面转型的过程, 同时

也意味着人的现代化,个性、创新和开放意识等现代性观念逐渐盛行,人的传统观念也在持续更新[4]。从现实逻辑上看,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代际差异产生与强化的根本动力,其通过改变个体的成长环境、价值导向和行为约束,塑造了不同代际群体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不同代际群体的生活场景和社会互动方式产生了显著差异[5]。第二,社会现代化的推进通常伴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转型,居民的养老观念也会随之发生转变。第三,随着社会现代化进行的加快,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断完善[6],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以及养老保险等多元保障形式的覆盖面持续扩大,为代际差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2.2. 代际差异与养老责任观念

养老责任观念又称养老责任认知或养老意愿,是指人们对养老行为的主观看法及其态度,通常包含由谁养老(即养老责任主体)、在哪养老(即养老地点)以及如何养老(即养老方式)等方面的内容[7]。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探讨有关影响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相关因素。个人和家庭层面,年龄、性别、城乡属性、婚姻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等因素被视为和居民养老责任观念发生转变相关的密切因素[8],而子女数量是否与其有密切联系则有待进一步探讨。一般认为,子女数量越多,家庭中可提供的代际照料支持就越多,因此居民越有可能偏向于传统子女养老观念。但随着社会加速转型持续冲击传统文化价值观,儿子和女儿在承担养老责任方面的差异可能会逐渐缩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依赖女儿养老的趋势正逐渐加强[9]。社会层面,社会整体的氛围会在主观上塑造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状况越好,居民的独立性就越强,依赖子女养老的程度就越低[10]。

基于不同出生队列产生的价值观差异,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同代际群体在养老责任认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随着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发展趋势的日益显著,子女能提供代际照料支持的能力也在不断被削弱,从而在现实层面加大了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代际张力”[11]。另一方面,出生年代越晚,个体在社会转型中接触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使其具备更高的互惠期望并进一步在观念上削弱了个体的传统子女养老责任观念[12]。可以说,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出生队列的群体已在现实层面和观念层面产生了显著的分化趋势,并进一步重构了个体的养老责任观念及其路径选择。

综合来看,学界普遍将焦点聚焦于探讨代际差异第养老责任观念产生的直接效应及其形成原因,缺乏探讨在社会现代化视角下不同代际群体的养老责任观念是否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代际差异对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 2: 代际差异对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

2.3. 生活幸福感、住房面积与养老责任观念及其城乡差异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养老责任观念的塑造与转变可能还会受到居民的实际住房面积以及城乡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住房作为居民实际拥有的物质资源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一方面,居住环境的优劣是个体能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13],住房面积更大、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更好的居民往往有更强的自主养老能力,因此会显著降低依赖子女提供代际照料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出生世代的不同,青年群体在现代社会中接触的新事物也会更多,其本身在现代社会会塑造更强的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意愿,因此和中老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责任观念,并最终将代际差异转化为养老责任观念层面的差异

[14]。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住房面积作为居民实际拥有的物质资源之一,其本身也是经济财富的重要象征,因此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可能也会越高[15]。使得和租房居住的居民相比,有自己住房以及住房面积较大的居民往往倾向于考虑追求更高品质的养老方式,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子女养老责任观念。

此外,有学者认为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还会受到其本身所处城乡地区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相对较差,家庭承担着主要的养老职责,因此家庭会对居民的住房条件产生显著影响[16]。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城镇地区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因此代际差异和住房条件产生的效应会被显著弱化[17]。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是否依旧显著有待进一步探讨。

总体而言,住房面积是否会在代际差异与养老责任观念之间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已有学者进行证实,但现有研究针对这一效应的检验机制较为单一,且未深入探讨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异对其效应的影响是否依旧显著?又是否有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住房面积在代际差异与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H4: 城乡差异显著调节代际差异与住房面积之间的关系

H5: 城乡差异显著调节住房面积在代际差异与养老责任观念之间的中介效应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2023”)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并负责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该数据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民生等多个领域,是社会学等学科常用的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权威数据之一,共计有效样本11326份,同时也是本文研究数据的全部来源。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把可能会影响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剔除了所有涉及“不知道”“拒绝回答”以及其他不符合实际的选项,最终获取有效样本共计5225份。同时,本文按照统计学对显著性的判定标准,以⁺、*、**、***分别表示在10%、5%、1%、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值为标准误。

3.2. 变量设计

3.2.1. 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在变量的选取过程中,本文根据以往研究和问卷的问题安排逻辑将“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作为测量核心被解释变量的指标,并将其重新赋值和编码为1=非子女养老(代表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观念,包含“由政府负责”“由老人自己负责”和“由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等选项)和2=子女养老(代表传统的子女养老观念)。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的代际差异。在选取变量时,本文首先计算居民的实际年龄,然后再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有关青年年龄的划分标准和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有关老年年龄的划分标准[18][19],将该变量重新赋值为三个组别:1=青年(18~35岁),2=中年(36~59岁),3=老年(60岁及以上)。在后续的实际分析过程中,均将青年组设为参照组。

3.2.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了基本人口特征和地区等方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重新编码和赋

值为：民族(1 = 少数民族, 2 = 汉族)、性别(1 = 男, 2 = 女)、文化水平(为连续变量, 并划分为 5 个层次: 0 = 文盲, 6 = 小学, 9 = 初中, 12 = 高中, 16 = 大学)、子女数(为连续变量, 0 = 0 个, 1 = 1 个, 2 = 2 个, 3 = 3 个及以上)、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处理, 最终将该变量变为 0~7 的连续变量)、地区(1 = 西部地区, 2 = 中部地区, 3 = 东部地区)。在处理地区变量时, 为避免某一个地区的样本量过少导致实际分析过程中的交互项不显著或产生偏误,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地区变量划分为三大地区[20], 同时将西部地区设为参照组; 将文化水平划分为从文盲到大学的连续变量, 得分越高, 意味着居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长[21]。

3.2.4.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住房面积变量根据问卷中实际记录的受访者回答的“套内建筑面积”。根据现有研究的观点, 住房面积是住房条件的核心测量指标之一, 因此用该变量测量住房条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本文保留了该变量的所有数据, 并最终得到一个从 5 平方米至 2000 平方米的连续变量。

调节变量为居住地。在变量的处理过程中, 本文根据我国对城乡的划分标准将该变量转化为 1 = 农村、2 = 城镇(包含“城市中心地区”“城市边缘地区或城乡结合部”和“镇”等选项)的二分变量[22]。

3.3. 模型建构

本文使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首先, 基于研究变量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 然后通过搭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初步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开展稳健性检验; 其次, 开展三分位数回归分析; 最后, 基于 Process 5.0 (Model 7)宏系统开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后得出最终结论。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 X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 Y 代表核心被解释变量, C 代表控制变量, W 代表调节变量, M 代表中介变量, $X \cdot W$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代际差异与调节变量居住地的交互项。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构建的二元 Logistic 基准回归模型为: $\text{Logit}[P(Y=1)] = \alpha_0 + \alpha_1 X + \sum_{k=1}^k \alpha_k C_k + \varepsilon$

2) 三分位回归模型

由于核心被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 无法直接开展分位数回归分析。因此, 本文以基准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的养老责任观念倾向预测概率为连续核心被解释变量, 并在 0.1、0.5、0.9 三个分位点上开展估计。在本文构建的三分位回归模型中, $Q_\tau(\tau|X)$ 为养老责任观念倾向在 τ 分位数上的条件分位数函数, β_τ 代表在 τ 分位上代际差异对养老责任观念的边际效应。通过比较 β_τ 在三个分位点上的差异, 判断代际差异对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是否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

本文构建的三分位回归模型为: $Q_\tau(\tau|X) = \beta_{0\tau} + \beta_{1\tau} X + \sum_{k=1}^k \beta_{k\tau} C_k + \varepsilon$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将直接使用 Process 5.0 宏系统中的 Model 7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为: $M = \delta_0 + \delta_1 X + \delta_2 W + \delta_3 X \cdot W + \sum_{k=1}^k \delta_k C_k + \varepsilon$; $Y = \theta_0 + \theta_1 X + \theta_2 M + \sum_{k=1}^k \theta_k C_k + \varepsilon$ 。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结果。数据显示, 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均值为 1.48, 说明居民整体的养老责任观念偏向于“非子女养老”, 且标准差为 $0.5 < 1$, 说明该变量的分布较为集中,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正处于从传统的家庭子女养老向现代的非子女养老转变的转型期。自变量代际差异的均值为 1.99, 说明中年群体的样本量占比较大, 这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布趋势基本相符, 为检验养老责任观念的代际差异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Table 1.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表 1.**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养老责任观念	1 = 非子女负责, 2 = 子女负责	6947	1	2	1.48	0.500
自变量	代际差异	1 = 青年, 2 = 中年, 3 = 老年	11,242	1	3	1.99	0.741
控制变量	民族	1 = 少数民族, 2 = 汉族	11,324	1	2	1.92	0.278
	性别	1 = 男, 2 = 女	11,326	1	2	1.45	0.498
	文化水平	0 = 文盲, 6 = 小学, 9 = 初中, 12 = 高中, 16 = 大学	11,320	0	16	11.49	4.625
	子女数	0 = 0 个, 1 = 1 个, 2 = 2 个, 3 = 3 个及以上	6966	0	3	0.83	0.757
	个人年收入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10,639	0	7	3.94	1.699
	地区	1 = 西部, 2 = 中部, 3 = 东部	11,318	1	3	2.27	0.803
中介变量	住房面积	5~2000 (单位: 平方米)	6722	5	2000	122.72	92.146
调节变量	居住地	1 = 农村, 2 = 城镇	11,256	1	2	1.69	0.463
有效个案数(成列)			5225				

控制变量层面, 大部分居民为汉族, 符合我国人口各民族的结构特征。性别为二分变量, 其中男性占比较大。地区变量中, 大部分居民来自东部地区, 与我国人口分布的区域特征基本相符。文化水平变量中, 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多数家庭的子女数为 1 个, 符合我国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的现实背景。个人年收入的标准差远大于 1 的阈值, 说明不同群体间的收入水平差异明显。

中介和调节变量方面, 居民整体的生活幸福感处于中上层次。住房面积为连续变量, 较大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反映出居民平均住房条件合理但个体间的差异显著。居住地方面, 大部分居民来自城镇地区。

4.2. 基准回归分析

在开展基准回归分析后, 得到了如表 2 所示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 在基准模型 1 中, 中年组和老年组的效应均显著为正($P < 0.01$, $P < 0.001$), 初步揭示了代际差异的分化趋势。但在基准模型 2 中, 加入控制变量以后, 中年组的效应转为边缘负向($P < 0.1$), 且老年组的效应依旧显著为负($P < 0.001$), 且效应绝对值大幅提升, 表明在控制其他干扰因素后, 以青年组为参照组, 中老年组均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责任观念, 且老年组的青年显著高于中年组, 说明代际差异不仅显著负向影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 且效应的绝对值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 假设 1 得证。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基准模型 1	基准模型 2
代际差异(1 = 青年)		
中年	0.186** (0.064)	-0.150+ (0.088)
老年	-0.253*** (0.067)	-0.883*** (0.097)
民族(1 = 少数民族)		-0.368*** (0.102)

续表

性别(1 = 男)		-0.280*** (0.057)
文化水平		-0.060*** (0.007)
子女数		0.132** (0.041)
个人年收入		-0.071*** (0.017)
地区(1 =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262*** (0.076)
东部地区		-0.827*** (0.073)
常量	-0.051 (0.053)	2.112*** (0.161)

与此同时,各控制变量产生的效应显示,汉族更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塑造作用;女性更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男性则更认同子女养老的传统养老责任观念;文化水平越高,居民越偏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责任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资本是弱化传统子女养老责任观念的关键因素之一;子女数越多,居民越偏向于传统子女养老责任观念,这可能与子女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有关;个人年收入越高,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倾向就越强;和西部地区相比,中东部地区均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且东部地区的效应绝对值显著大于中部地区,说明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影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整体上看,基准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控制变量的作用强度,为后文进一步的检验工作奠定了基础。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 1000 次 Bootstrap 抽样法和替换核心自变量的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数据显示,基于 1000 次 Bootstrap 抽样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在基准模型 1 中,中年组和老年组的效应及其作用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中基准模型 1 的效应特征完全一致。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中年组的效应转为边际负向($P < 0.1$),且老年组的效应绝对值大幅提升,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中中老年组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其次,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未分组的年龄连续变量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年龄变量产生的效应均显著为负($P < 0.001$),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越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现代养老责任观念,这一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代际差异与居民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关系的稳健性。

Table 3. The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Bootstrap 抽样后的结果		替换核心自变量的结果	
	基准模型 1	基准模型 2	基准模型 1	基准模型 2
代际差异(1 = 青年)				
中年	0.186** (0.062)	-0.150+ (0.089)		
老年	-0.253*** (0.066)	-0.883*** (0.102)		
年龄			-0.007*** (0.001)	-0.026*** (0.0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0.051 (0.052)	2.112*** (0.009)	0.307*** (0.078)	3.121*** (0.190)

4.4.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三分位回归的方式检验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是否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由于分位回归中二分变量无法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本文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算居民养老责任观念倾向的预测概率，然后再将其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并纳入分位回归模型，并基于 0.1、0.5、0.9 三个分位点开展分析得到如表 4 的回归数据和图 1 的回归系数变化趋势。数据显示，中老年组在三个分位点上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P < 0.001)，这表明中老年群体更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且老年群体的倾向意愿更强，即代价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假设 2 得证。

Table 4. The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表 4. 分位数回归结果

自变量	分位点 0.1	分位点 0.5	分位点 0.9
代际差异(1 = 青年)			
中年	-0.035*** (0.000)	-0.035*** (0.000)	-0.034*** (0.000)
老年	-0.205*** (0.000)	-0.207*** (0.000)	-0.203*** (0.000)
民族(1 = 少数民族)	-0.079*** (0.000)	-0.087*** (0.000)	-0.085*** (0.000)
性别(1 = 男)	-0.065*** (0.000)	-0.066*** (0.000)	-0.064*** (0.000)
文化水平	-0.014*** (0.000)	-0.014*** (0.000)	-0.014*** (0.000)
子女数	0.031*** (0.000)	0.031*** (0.000)	0.030*** (0.000)
个人年收入	-0.017*** (0.000)	-0.017*** (0.000)	-0.016*** (0.000)
地区(1 =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056*** (0.000)	-0.061*** (0.000)	-0.060*** (0.000)
东部地区	-0.189*** (0.000)	-0.199*** (0.000)	-0.192*** (0.00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1.119*** (0.000)	1.153*** (0.001)	1.143*** (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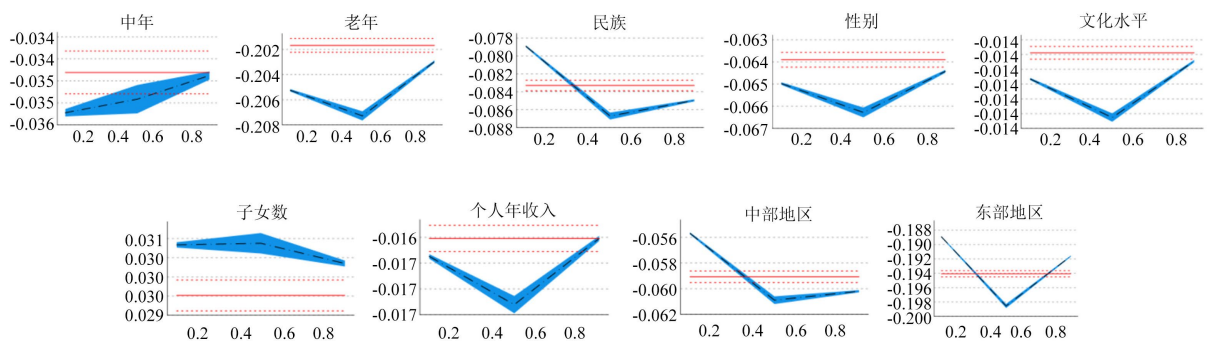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change in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图 1. 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

此外，图 1 显示，在结合表 4 数据的趋势情况下，老年组、民族、性别、东部地区等核心变量的参数曲线均呈现出明显的分位波动趋势，说明这些变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普通线性回归的平均效应难以完全反映其真实作用。相对比之下，其他变量的参数曲线则相对平缓，表明其效应在不同观念群

体中更为稳定。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中老年群体的工作履历更为稳定，因此和青年群体相比代际差异的效应差距更明显；男女双方可能基于职业和家庭责任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可能会推动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产生一定的异质性；文化水平越高，居民的认知能力就越强，因此可能有更强的自主性，从而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子女数越多，可能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就越多，因此居民倾向于传统养老责任观念；东中部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相对更为完善，因此居民更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进一步分析各参数图的分布趋势可知，在高子女养老责任观念倾向群体中，代际差异和地区对养老责任观念的塑造作用更为突出，说明传统养老责任观念越强的群体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越显著，而养老责任观念越倾向于非子女养老的群体，受结构因素的影响则相对平缓[23]。

4.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判断标准，在开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时，首先要检验中介效应，然后再检验调节效应[24]。若经过 5000 次 Bootstrap 抽样估计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含 0，则可视为间接效应显著(即中介变量效应的显著性 $P < 0.05$)。为进一步检验住房面积是否会在代际差异与居民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本文基于 Model 7 开展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并得到了如表 5 所示的数据。由于住房面积变量的范围较大，因此在开展中介效应分析时，模型的效应绝对值相对较大。数据显示，老年组对养老责任观念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P < 0.001$)，这与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Table 5.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Based on housing area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基于住房面积

变量	模型 1	全模型
	住房面积	养老责任观念
代际差异(1 = 青年)		
中年	-43.615** (13.420)	-0.135 (0.093)
老年	-46.787*** (13.588)	-0.835*** (0.103)
居住地	-49.338*** (6.841)	
代际差异 × 居住地(1 = 青年)		
代际差异 × 居住地(2 = 中年)	22.062** (7.807)	
代际差异 × 居住地(3 = 老年)	16.797* (7.823)	
住房面积		0.002*** (0.000)
间接效应		
中年	1 = 农村	-0.036* (0.013)
	2 = 城镇	0.001 (0.009)
老年	1 = 农村	-0.050* (0.016)
	2 = 城镇	-0.022* (0.010)
调节中介指数		
	2 = 中年	0.037* (0.015)
	3 = 老年	0.028* (0.014)
控制变量		
常量	已控制	已控制
	288.056*** (15.171)	2.353*** (0.268)

进一步分析可知,住房面积只对农村地区的中年群体产生显著效应,而对城乡地区的老年群体则均产生了显著效应,且农村地区老年群体产生的效应绝对值显著大于城镇地区的老年群体,即住房面积不仅在代际差异与居民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还呈现出较强的城乡异质性,假设3得证。其次,代际差异对住房面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 < 0.001$, $P < 0.01$),且代价差异和居住地的交互性均显著为正($P < 0.01$, $P < 0.05$),表明居住地显著调节代际差异和住房面积之间的关系,假设4得证。最后,调节中介指数显示,以青年组为参照组,城乡差异在中老年组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均显著,即在住房面积对代际差异与居民养老责任观念之间关系发挥的中介效应中,城乡差异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5得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托CGSS2023数据,聚焦代际差异对居民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在开展一系列实证分析后发现,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已发生明显转变。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已逐渐被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替代,使得老年群体拥有了更大的经济独立性并逐渐弱化对子女养老责任观念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网络媒介信息的普及,老年群体对养老观念的认知可能会变得更为理性,意识到子女可能会因为忙于工作而难以为自己提供长期的养老服务,从而形成更加理性化的养老决策。

从实证结果上看:第一,代际差异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且呈现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现代养老责任观念的特征,这与一般认知和现有大部分研究中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子女养老的传统养老责任观念相悖。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表明我国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已经发生转变。第二,代际差异对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存在观念强度层面的异质性,且代际差异在高传统养老倾向群体中产生的边际效应略有弱化。第三,住房面积在代际差异与居民的养老责任观念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城乡差异不仅显著调节代际差异与住房面积之间的关系,且在整体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城乡差异也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要顺应居民养老责任观念已经发生转变的现状,持续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缓解中老年群体未来养老的焦虑,并持续加大农村地区的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及稳步提升城镇地区的养老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 [1] 马靖宇,刘惠森,许佳贤,等. 社会保障对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的影响[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3): 92-96.
- [2] 张扬. 我国公众养老观念对人口生育与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J]. 医学与社会, 2022, 35(7): 7-11.
- [3] 张波. 中国谁来养老?——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99-109, 170-171.
- [4] Inkeles, A. (1969) Making Men Modern: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 208-225. <https://doi.org/10.1086/224767>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6] 余澍.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政策范式与中国选择[J]. 社会保障评论, 2026, 10(1): 47-60.
- [7] 丁志宏. 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J]. 人口研究, 2014, 38(4): 101-111.
- [8] 孙鹏娟,沈定.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7(2): 11-20.
- [9] 张翠娥,杨政怡. 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寻乌县的调查数据[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5): 27-33.
- [10] 刘金华,谭静.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 2016(4): 13-18.
- [11] Grundy, E. and Henretta, J.C. (2006) Between Elderly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A New Look 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 Provided by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Ageing and Society*, **26**, 707-722.

<https://doi.org/10.1017/s0144686x06004934>

- [12] 朱海龙, 欧阳盼. 中国人养老观念的转变与思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44(1): 88-97.
- [13] Johnson, R. (2005) Mental Health and Housing: Making the Links in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4**, 21-28. <https://doi.org/10.1108/17465729200500028>
- [14] 聂建亮, 王苗苗. 安居能否安康?——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J]. 江汉学术, 2026, 45(1): 5-20.
- [15] 程晗蓓, 邹游, 林赛南, 等. 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7): 1210-1223.
- [16] 蔡弘, 陈红星, 朱永甜. 城乡居民养老方式选择差异与趋势变迁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25(7): 96-109.
- [17] 侯慧丽. 城乡老龄化倒置背景下农村养老模式与文化基础探究[J]. 中国国情国力, 2025(4): 46-50.
- [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2026-04-11.
- [19]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J]. 中国统计, 2021(5): 10-11.
- [20] 姚宏, 孙根年. 我国三大地带国内旅游市场竞争态及转移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8(3): 53-56+69.
- [2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人口受教育情况[J]. 中国统计, 2021(5): 11-13.
- [22]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tjbz/gjtjbz/202302/t20230213_1902742.html, 2026-04-11.
- [23] Koenker, R. and Bassett, G. (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 33-50. <https://doi.org/10.2307/1913643>
- [24]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 心理学报, 2006(3): 448-452.